

龙云与云南抗战

谢本书

内容提要 抗日是龙云一生的功绩之一,他先后派出滇军近 40 万人参加抗战、修筑滇缅公路等,有力地支援了全国抗战。抗日战争时期,龙云政治思想也发生重要转变,参与抗日救亡运动,秘密加入民主同盟,促进了昆明民主堡垒的形成。在汪精卫经昆明出逃叛国的过程中,龙云是清白的,这一疑案应该画上句号。抗战时期,龙云作为爱国将领是当之无愧的。

关键词 龙云 云南抗战 爱国者

龙云在民国时期,从 1927 年至 1945 年,统治云南达 18 年之久。1962 年,周恩来在龙云去世时,曾明确指出,龙云一生有三大功绩:抗日、反蒋、联共。1984 年龙云诞辰 100 周年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讲话说,龙云的“一生是一个光荣的爱国者的一生”。而抗日战争时期,则是龙云政治思想转变的重要年代,也是他一生中表现出自己是一个爱国者的重要年代。

一 坚持抗日立场

龙云(1884—1962 年),字志舟,彝族,彝名纳吉乌梯,云南昭

笔者访问作家马子华记录稿。

《人民日报》1984 年 11 月 20 日。

通人。他于辛亥革命时期加入滇军,后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接受了正规的军事训练。护国战争开始以后,龙云担任云南都督唐继尧的侍从副官,深得唐继尧的信任,先后升任近卫军中队长、大队附、警卫军大队长等职,至1921年已任近卫第十一团团团长。1922年因护送唐继尧“二次回滇”有功,升任滇军第五军军长兼滇中镇守使,成为滇军实权人物。

大革命时期,中共云南地下组织掀起了反对滇系军阀唐继尧的群众斗争,龙云深受影响,遂于1927年2月6日,与胡若愚、张汝骥等滇军将领联合发动了“二六”政变,推翻了唐继尧对云南的14年统治。在随后的将近3年内,龙云与胡若愚、张汝骥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混战。到1929年下半年龙云击败胡、张联军,统一了云南,确立了自己对云南的统治。

其实,1927年8月龙云即已就任蒋介石委任的陆军第三十八军军长职,兼代云南省务委员会主席,1928年1月起任云南省政府主席,随后又兼任过第十三路军总指挥、讨逆军第十路总指挥、第二路军总司令、滇黔绥靖公署主任、“滇黔剿共军”总司令等职。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龙云又兼任过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云南军管区司令、昆明行营主任等职。直至1945年10月,蒋介石指使杜聿明在昆明发动政变,龙云被迫离开云南为止,龙云统治云南18年之久,是民国时期任职云南主要领导职务时间最长的一位。

龙云统治云南之初,继承了唐继尧军阀统治的衣钵,一面追随蒋介石镇压共产党,一面建设“半独立”式的“新云南”。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在民族危亡的关头,龙云的

龙云在1929年的《云南省政府委员会改组就职宣言》中提出,要建设一个“新云南”。参见喻宗泽主编《云南行政纪实》第1册,云南省政府印,1943年版。

政治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8月2日,龙云即致电蒋介石称:“时局至此,非集我全民力量,作长期抗战之计,无以救危亡。”又说,战斗开始,滇军“愿以六万至八万之数,组成建制部队,由职亲率,开往前方增加(抗日力量),或留长江沿海一带布防,均不无裨补”。表示自己愿亲自率领部队,奔赴抗日前线。蒋介石非常高兴,立即复电龙云:“忠贞谋国,至深赞佩。”

8月8日,龙云奉命出席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的“国防会议”,乘飞机离开昆明经成都、西安转赴南京。龙云到达西安时,与亦拟赴南京出席国防会议的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巧遇,于是龙、周、朱、叶遂同乘一架飞机赴南京。途中以及在南京期间,朱德利用自己早年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及滇军任职的经历,与龙云多次交谈,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团结御侮的决心,使龙云深感:“与君一夕谈,胜读十年书。”这对龙云政治思想的转变起到了促动作用。

在南京期间,龙云三番五次地表示,现在国难当头,大家都应“少说废话,多负责任。身为地方行政负责者,当尽以地方所有之人力财力,贡献国家,牺牲一切,奋斗到底,俾期挽救危亡”。他还直接向蒋介石说明,云南亦可以出兵20万,支援前线抗战。

龙云身为云南省政府主席、滇军统帅,虽然后来没有亲赴前

云南省档案馆编:《滇军抗战密电集》(云南档案史料丛编)。云南省档案馆1995年版,第1页。该书搜集了云南省档案馆所藏大量珍贵资料,大部为第一次刊印。

同上书,第2页。

龙云与其亲信马铃的谈话,转引自拙著《龙云传》,四川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第160页。

龚自知:《随节入京记》,原载《云南日报》1937年8月,转见《云南文史丛刊》第3辑,第107页。

白肇学:《六十军编成和参加鲁南战役述略》,《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98页。

线,然而滇军在前线的重大行动,都是请示龙云后执行的。龙云坚持抗战的态度是明确的,无论他在给蒋介石的电报或指挥滇军行动的电报中,都是一贯的。如,龙云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坚持既定国策,贯彻始终,诚为目前之惟一救国途径。”依照“持久抗战之意旨以为归宿,勿稍分歧,方能步调一致”。龙云在指示部属的电报中,则要求滇军出师抗战应注意4点:“(一)重视帅令;(二)行动务求敏捷;(三)遇有机可乘时,不惜牺牲,图立大功;(四)随时随刻须有机动性。”他并告诫说:“当此国家民族危急存亡之秋,本省竭尽人力物力,悉率敝赋以出,纯系赤诚为国起见”;滇军各部都应“亲睦团结,化除意见”,以便共同对敌。这表现出龙云坚持抗战、团结对敌的政治立场。

二 指挥滇军远征

1937年8月,龙云参加南京“国防会议”回昆明后,召集地方党政军负责人会议,再次表明了抗日决心。他说:“看局势是危急的,我们自己要迅速充分准备。大家不要怕,在北方有八路军,南方各省很多朋友也都有决心抗日”,我们应该立即编成一个军,出师抗战。为此,龙云拨款新滇币万元,仅用28天的时间,编成约4万人的一个军,番号为陆军第六十军,以卢汉为军长,下辖一八二、一八三、一八四师,分别以安恩溥、高荫槐、张冲为师长。

9月9日,六十军在昆明誓师出发。这支军队在龙云的精心

《龙云恳坚持抗战既定国策贯彻始终电》,《滇军抗战密电集》,第52页。

《龙云指示赴京作战并注意四事电》、《龙云令团结尽责电》,见《滇军抗战密电集》,第42、204页。

龙云:《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见拙著《龙云传》附录,第333—349页。

武装和训练下,武器精良,军容整齐,军纪也较好。杜聿明就曾说过,抗日战争时,“我曾在湘潭附近遇到龙云的部队,觉得‘中央军’同这支‘云南军’比起来,军容上似有逊色”。六十军到武汉时,蒋介石曾命这支军容整齐、士气旺盛的军队,绕闹市一周,以示我国尚有如此训练有素的军队可投入战斗,以安民心。滇军在武汉游行时,蒋介石的德国顾问看到后,惊异地对蒋介石说:“卢汉率领的滇军是你们中国的骄傲,是最有力的部队。”

蒋介石对六十军出师亦颇重视,即命开赴前线,保卫首都南京。龙云也下命六十军,要“在敌人以前赶到南京为是。”然而,六十军先头部队已近金华之际,南京即已沦陷,部队乃返回武汉待命。

1938年4月下旬,六十军奉命赴台儿庄,参加第二阶段的徐州会战。六十军英勇抗敌,牺牲惨重,龙云毫不气馁,多次电令卢汉明白地说:“战斗之目的,不在牺牲之多寡,而在意志之坚定,务须从容整理,振作士气。”又说,滇军坚持抗敌,“如此应付强敌,不但扼守阵地,且能出而反攻,似此忠勇壮烈,纵有任何牺牲,亦属光荣。惟恐各长官不无目击心伤,务望再接再厉,振作士气,始终勿懈。须知目前鲁南之战,已成为中日相争之焦点,胜负攸关,无论如何牺牲,必留为中日战争史上最光荣之一页也”。“适如总理所云,我死国生,我生国死。虽有损失,亦无法逃避。况战争之道,愈

杜聿明:《蒋介石解决龙云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12—13页。

卢汉:《陆军第六十军参加徐州会战概况》,《云南文史丛刊》1985年第2期,第8页。

《缪云台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65页。

《龙云令滇军在敌人以前赶到南京电》,《滇军抗战密电集》,第39页。

打愈精,军心愈战愈固,惟有硬起心肠,贯彻初衷,以求最后之胜利。”

六十军各部在以台儿庄附近禹王山为中心的战斗中,坚持20多天阵地战,粉碎了敌人渡过运河威胁徐州的企图,取得了重大胜利。在这次战斗中,六十军投入战斗人数为35123人,伤亡达18844人,营连排长亦伤亡过半。龙云对滇军的英勇战斗非常自豪地说:“国家自由平等,只有鲜血可以换取。”六十军英勇作战,望滇人继续努力。”

徐州会战以后,滇军名声大震。继之,六十军扩编为第三十军团,辖第六十、第五十八两军;再扩编为第一集团军,辖第六十、第五十八及新三军,先后参加武汉会战、长沙会战及赣北战役。1940年滇南形势紧张,遂在滇南成立第一集团军总部,下辖第一、二两路军指挥部。1945年又编组为滇越边区总部,将第一集团军扩编为第一方面军,辖第一、第九两集团军。

滇军先后在鲁南、武汉、湘北、赣北及滇南作战,“均能忠勇奋发,一往无前,弹雨枪林,伤亡枕籍”。据统计,在抗日战争期间,云南派出滇军支援前线抗战约近40万人,伤亡约10万人,这个数字不包括民众伤亡的数字。此外,征送其他中央杂项部队之兵,又约5万人。这对当时仅有900多万人口的云南省来说,先后派出滇军数十万人,开赴前线抗战,而且几乎全部装备、大部给养均由

龙云在1938年4月25日、28日、5月1日给卢汉电报,见《滇军抗战密电集》,第91、92、96页。

李佐:《关于滇军沿革和六十军历史变迁概况》,《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第55—56页。

《云南日报》1938年7月29日。

《前第一方面军司令部代电》,见《滇军抗战密电集》,第487页。

地方自筹,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数目。对此,朱德在1938年8月21日给龙云的信中,给予了热情的肯定。他说:“近年来,云南在吾兄领导下已有不少进步。抗战军兴,滇省输送20万军队于前线,输助物资,贡献于国家民族者尤多。”龙云亦曾表示:“滇省原为贫瘠之区,但国事如此,誓以将政府历年所蓄,及民间所有公私力量,悉数准备贡献国家”,而无怨言。可以看出,龙云统率的滇军,对前线抗战的支援是有力的。

三 支持滇西抗战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此后半年,日军先后占领了菲律宾、关岛、威克岛、香港、马来亚、新加坡、印度支那及缅甸等地。1942年5月初,日军从缅甸进入我滇西畹町、龙陵、腾冲等地,我守桥工兵炸毁了怒江惠通桥,阻止敌人深入怒江以东。延至1943年初,日军势力向北延伸达到福贡和贡山地区,向南到达孟定地区,怒江以西云南境内长达数百公里的狭长地带,面积约8.3万平方公里。根据缴获的日军作战地图得知,日军在我滇西地区分为6个守备区,其兵力约1.5—2万人。于是,云南由抗日后方变成了抗日前线。

日军入侵滇西地区后,龙云全力支持中央军在滇西抗击日寇的军事行动。他以省政府的名义号召全省人民和各级地方政府,

郑崇贤:《滇声》,香港有利印务公司1946年版,第17页。

《朱德致龙云的信》,见《云南图书馆》杂志1981年3、4期合刊,第1—2页。

《龙云为补充团已成立将赴前方电》,见《滇军抗战密电集》,第75页。

台湾“国防部”史政局编:《抗日战史》卷九,《西南及滇缅作战》,台北1990年版,第373页。

宋希濂:《鹰犬将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61页。

支持滇西抗战,要求滇西沦陷区各级政府开展游击战争,组织民众自卫部队,协助中国远征军打击敌人,“随时向驻军长官请示机宜”。龙云还令滇西保山地区军政首长说:“军民务须同心协力,一致合作。在此期间,凡在保山部队、地方团队及民众,一律听宋总司令希濂指挥,精诚团结,以收军民一致合作之效,切勿各行其是,步调分歧。”同时,龙云还向时任驻滇西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的宋希濂通报,请他在滇西统一指挥作战:“目前保山所有军民应如何使用,悉听兄指挥,万勿客气,昨已电令各方知照矣。”龙云还应蒋介石及远征军各部的要求,组织民工,破坏滇缅公路、滇越铁路路基及便道,以及组织民工运送军粮、弹药和伤员等。龙云对边境土司头人状况,也很关心,希望组织他们抗战。据李根源记载,他以云贵监察使身份,“奉蒋委员长电令及监察院电催和龙主席嘱托”,赴滇西宣传抗战,组织民众,发表《告滇西父老书》,号召滇西各族人民戮力同心,协同作战,“抱定更大牺牲的决心,驱除日寇,恢复失土。”龙云还任命了著名爱国士绅张问德为腾冲抗日县长,领导腾冲及滇西沦陷区各族人民抗日。张问德不辞劳苦,坚持抗敌,多次粉碎敌人的诱降活动,并因此获得以龙云为首的云南省政府的嘉奖。

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滇西反攻战全面展开,投入滇西反攻战的正规部队主要是宋希濂的第十一集团军和霍揆彰的第二十

《云南档案史料》1989年第4期,第22页。

《云南档案史料》1989年第4期,第19页。

《龙云请宋希濂指挥保山抗战电》,见《滇军抗战密电集》,第457页。

李根源:《告滇西父老书》,见《新编曲石文录》,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2页。

《云南省民政厅嘉奖腾冲县长张问德》,见《保山地区史志文辑》第4辑,云南德宏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378页。

集团军共约 16 万人,在云南省政府和云南各族人民的支援、支持下,进行了英勇的战斗。先后经过艰苦的松山、腾冲、龙陵战役,终于在 1945 年 1 月 20 日最后收复边境城市畹町。这样,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反攻,滇西沦陷区终于全部收复。在这次战役中,日军伤亡和被俘共 21057 人,而中国远征军伤亡及失踪达 66294 人。

滇西抗战的胜利,与云南各族人民及云南省政府的热情支持是分不开的。仅以 1944 年反攻腾冲战役为例,腾冲地区就出动了民夫 3.8 万余人,为部队运送粮秣弹药;用于向导、侦察、救护的勤务民夫约 5000 余人;后又发动 3000 余人抢修腾龙公路、机场等。这就是说,腾冲之役,共使用民夫 4.6 万余人。而据宋希濂估计,“当时投入这场运输任务斗争的滇西老百姓,至少有二三十万人”。

四 修筑滇缅公路

以龙云为首的云南省政府,为了支援抗战,曾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其中修筑滇缅公路是这些努力中的重要一项。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日本于 1937 年 8 月 20 日宣布封锁中国沿海,阻止其他国家援华物资进入中国。由于海运受阻,新辟对外通道就成为当时中国的当务之急。尽管那时还存在着桂越公路及滇越铁路,但线路已受到威胁。因此,8 月召开的“国防会议”期间,龙云即向蒋介石建议加紧修筑滇缅公路,蒋介石亦同意此项要求,通知交通部协助办理。龙云回到昆明后,立即抓紧筹办,并

《档案资料》,转引自张宪文主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07 页。

宋希濂:《远征军在滇西的整训和反攻》,见《文史资料选辑》第 8 辑,第 76 页。

向在腾冲的第一殖边督办李日垓通报说：“中日战争，日渐激烈，范围日渐扩大。与我接近之海岸，亦被其封锁。滇缅公路已成必要之交通，尚希积极赶办。当此国难时期，非严厉督促，实难收效也。”

1937年10月，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王芄生来到昆明，与云南共商修路事项。国民政府决定，筑路费用由中央与地方政府各负担一半，为此中央政府拨款200万元，施工力量由云南省政府组织。其时，昆明至下关段411.6公里已有毛路，再加工即可；下关至畹町段547.8公里需要新修，使之内联贵昆公路，外接缅甸腊戍——曼德勒——仰光铁路。畹町至木姐路段须新筑18公里，与滇缅公路连接，由缪云台赴缅甸，与缅政府谈判，由英缅当局负责修筑。

从1937年12月起，云南省政府征调民工，每天上阵达15—20万人，多时达30万人。龙云给各县县长下达的命令是，必须如期完成，否则自己带着手铐来见。当时缺少筑路机械，主要靠人力挖山开路，劳动十分艰苦。工地没有住房，风餐露宿；冬天高山区，以烤火熬过难眠之夜；夏天在河谷地区，汗流浹背，瘴症流行。在整个修路过程中，民工伤亡在万人以上。为了补充劳力，妇女也走上了艰苦的筑路工地。

经过苦战，到1938年8月底滇缅公路中国段全程959.4公里全线通车。在9个月内共完成土方1123万立方米，石方110万立方米，共修筑石拱和石台木面小桥169座，石镶涵洞1443道，木便桥函413道，大中型钢索吊桥2座，石台木面桥2座，木桥3座，共

《龙云希严督赶修滇缅公路电》，见《滇军抗战密电集》，第430页。

《缪云台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99—100页。

铺泥结碎石路面 900 多公里。

美国驻华大使詹森考察这条线路后向美国总统罗斯福报告说：“这条公路选线适当，工程艰巨浩大，没有机械施工而全凭人力修成，实属不易，可同巴拿马运河工程媲美。”滇缅公路通车后，立即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到 12 月初第一批军用物资即通过这条公路运进畹町，再转运到昆明。据统计，仅 1941 年，通过滇缅公路运入中国的军用物资就达 13 万多吨。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中国对外交通断绝，滇缅公路几乎成为抗战时期中国唯一的对外陆上交通线，成了抗战的输血管、生命线。

龙云领导的云南政府，不仅动员人民筑路支援抗战，还号召为抗战捐献。如 1941 年全国捐献飞机的活动中，云南人民共献机 30 架，名列全国第一，得到了军委会副委员长冯玉祥的表彰：“云南虽是边疆多民族省份，抗日爱国热忱不后于各省市，应受表扬。”

五 参与抗日民主运动

1937 年 8 月，朱德与龙云的交谈，使龙云深受启发。此后，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中共云南省工委通过几方面渠道继续做龙云的工作。一是通过倾向进步的龙云的部属张冲的关系；二是通过中苏文化协会会长刘震寰（他当时是龙云的顾问）；三是通过杨竹庵、廖品行、刘耀阳和云南省参议会议长等人，他们主要是劝说龙云打击

云南省交通厅：《云南公路史》第 1 册，国防文化出版公司 1989 年版，第 113 页。

龙云：《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转见拙著《龙云传》附录，第 338 页。

杨西园：《抗战时期云南献机记略》，见《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 6 辑，第 57 页。

蒋介石派遣的特务,抵制蒋介石势力挤进云南,促进龙云参加救亡运动和民主运动。

同一时期,中共云南省工委根据中共南方局的指示,向龙云提出了10条建议,主要内容是:坚持团结抗日;与川康合作,互相支援;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加强联系,互相配合;多接近社会各界爱国民主人士;防范国民党中央在云南的驻军,杜聿明部在昆明的防守司令部,醉翁之意是明显的;安定云南的社会秩序;增强地方军事实力,改进军人政治工作;独立自主地办好云南经济、文化事业和新闻工作。龙云后来大体上是依据这些建议进行工作的。

1943年10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董必武派华岗、周新民、李文宜先后到云南,帮助民盟建立组织,做好争取龙云等地方实力派的工作。华岗经龙云同意,还在滇黔绥靖公署内设立了秘密的电台,以便与延安中共中央和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联系。

在中共的争取和影响下,龙云支持民主运动的态度愈来愈明朗。例如,蒋介石的特务头子康泽到昆明,要求龙云抓捕中共地下党员。龙云说:“拿出证据来,我可以办。”结果康泽不知是拿不出证据,还是不敢拿出证据,此事就不了了之。特务们要求龙云镇压学生民主运动,龙云却说:“学生们都是好爱国的……有些人无事找事,学生们说几句话就要根究,教授讲学也要干涉,结果越压越闹,‘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其伤实多’。有些人不听我的话乱来,以后闹出事来,我就不管。”龙云的表态使特务们不敢采取公开行动了。

参见孙代兴、吴宝璋主编:《云南抗日战争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1页;又参见《南方局领导时期云南统一战线工作》,载《南方局党史资料 统一战线工作》,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358页。

赵振奎:《龙云和蒋介石合与分之我见》,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研究集刊》1983年第2期,第54页。

在昆明多次发生的青年学生的民主运动,龙云并非是“不管”,而是支持,甚至还派兵保护,直接参与其中。昆明成为抗战时期著名的“民主堡垒”,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中共组织的领导和号召,也有广大群众的觉醒,当然也还有龙云的支持和保护。正如王昆仑、楚图南所说:“昆明一度成为大后方的抗日民主运动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是同龙云先生的同情和支持分不开的。”

1944年底,龙云在著名民主人士、民盟创始人张澜的帮助下,秘密参加了民主同盟,成为民主派的一名战士。龙云成为民盟盟员,对抗战时期昆明成为“民主堡垒”的事实,有着明显的关连。

六 揭开历史疑案

抗战初期,汪精卫途经昆明去越南,然后投敌叛国。在他途经昆明时,与龙云曾有秘密交谈,情况如何,外人不得而知,因此历来说法和评价不一,成了一桩历史疑案。陈璧君的侄子、汪精卫集团的重要成员陈春圃甚至有这样的回忆,他说,陈璧君在1938年10月飞往昆明时,曾多次约见龙云,称赞龙云“精明能干,明大体”,所以后来汪精卫经昆明出逃,就是根据陈璧君的意见行事的。12月18日,汪精卫出逃路过昆明时,已把投敌的“全部计划毫无保留地告诉了龙云,得到龙的赞同”。日本人也认为:“龙云一向是汪的志同道合的人。”于是,龙云成了与汪精卫合谋的叛国“罪人”。

王昆仑、楚图南:《怀念龙云先生》,《人民日报》1984年11月19日。

同上。楚图南还参加了龙云秘密的入盟仪式。后来,龙云成了民革领导成员,遂不再参加民盟的活动。

陈春圃:《汪精卫投敌内幕》,见《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44页。

(日)犬养健:《长江仍在奔流》,转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320页。

汪精卫在公开发表“艳电”投敌之后,其爪牙们不断宣称,龙云是可能“响应”的重要人物。龙云的这一“污点”似乎很难说清了。

笔者在龙绳文(龙云的第四子、美籍华人)生前,曾就此事向他询问。龙绳文说,关于这件事,汪精卫后来曾给龙云有过一封很长的信,对此事做了解释,它有助于说明事实的全部经过。他曾看过此信,可是此信至今下落不明,将来如果发现,可以公诸于世。他表示相信,事情是会水落石出的。

汪精卫于1938年12月18日以“赴滇讲学”为名飞往昆明,19日下午由昆明飞往越南河内,在昆明约24小时,曾与龙云秘密交谈。汪精卫集团方面人士说,汪已将全部“和平运动”的计划告诉了龙云。看来,这话并不假,然而计划是否“得到龙的赞同”,这就值得考究了。

12月19日,龙云就曾用电报向蒋介石报告汪精卫的行踪说:“汪副总裁昨日到滇,本日深感不适,午后二时已离滇飞航河内。”这是龙云的首次报告,以后还多次报告。12月21日,龙云再电蒋介石,报告了汪精卫要与日本进行所谓的“和平事件”,他说:“汪先生此次匆匆离滇,曾以效电略呈在案。查汪到滇之日,身感不适,未及深探,其态度亦不似昔日之安祥,不无诧异。临行时,始道出真语,谓与日有约,须到港商洽中日和平事件,若能成功,国家之福,万不一成,则暂不返渝,亦不作为离开钧座之工作。职观其行,早有此种心理,惟关系重大,未识在渝时与钧切实讨论及此否?”龙云在这里除了报告外,并未谈及自己的态度。汪当时是

《龙云致蒋介石效电》(1938年12月19日),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6编,台北1981年版,第46页。

《龙云致蒋介石马电》(1938年12月2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6编,第47页。

国民党的副总裁,其地位仅次于蒋,龙云作为一省的地方官对汪精卫又能怎样呢?他除了报告、请示、询问外,很难做别的事情。

其实,龙云在得知汪精卫“道出真语”以后,并不是赞同,而是震惊和忧虑。在12月22日,龙云给卢汉的密电中,表露了自己的心态。他说:“汪先生前日到滇,昨赴港,愿效昔之李鸿章、今之张伯伦,与日方直接商洽,不顾一切,力主和议,加入防共协定。因在渝受人攻击,蒋、汪之间亦未尽同意,故谓成则返渝,否则不再返渝,云云。语气愤慨,大有各行其志之慨。大局如此,兄闻之忧心如焚,党内纠纷从此又开始矣。兄为杞人之忧,宿食俱废,三日不能成眠,如似大病,故深望弟早日告痊也。”这个密电真实地反映了龙云对汪精卫出逃的情绪。龙云担忧的是“党内纠纷”的加剧,而国民党的分裂可能影响全民抗战,因而使他“宿食俱废,三日不能成眠”。充满这个电文的显然不是对汪精卫的“支持”、“赞同”,而是震惊及忧虑。

问题不在于汪精卫是否告诉了龙云关于自己的“和平计划”,而在于龙云是否真正地表示了对汪的支持或赞同。12月29日,汪精卫在河内发出“艳电”,公开表明了投敌态度后,龙云立即再电蒋介石说:汪精卫艳电“在异地突然发表,一般视听,不无惊疑。幸国人在委座领导之下,确知国策久定,毫不为其动摇。故汪之议论,对外虽属奇闻,受敌愚弄;对内仍毫无影响,祈释履注。”

到1939年4月13日,龙云就汪精卫事件向蒋介石再做专门报告,进一步表明自己的态度说:“查汪氏前由滇赴越及发出艳电,

《龙云告卢汉汪精卫离滇赴港等电》,见《滇军抗战密电集》,第214页。此时,卢汉也在病中,故望其早日告痊,以便分忧。

《龙云致蒋介石歌电》(1938年12月2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6编,第49页。

又曾仲鸣被刺前后大概情形,均经先后电呈。近接薛伯陵来电,始知汪氏及其左右,不免在外招摇,有意簧鼓,实际上职与汪氏素无往还,此次短期接触,已稔知其为人,既不磊落光明,又不忠厚安分,在其艳电发出后,职未加以攻击,犹本古人薄责于人之义,未肯论其长短,且各方正攻击汪氏,亦不必再下井投石,亦即遵钧座宽厚待人,不咎既往之旨,为留余地。但此种谣诼,对内虽自问坦然,对外仍恐不免有人怀疑,拟在相当时期,将其前后经过,完全公布,纯用事实,以正视听。”报告最后表示:“盖滇者与我公同一命运,在此敌人力图分化,汪氏被利用之时,吾辈军人,不论任何职责,惟有立定脚跟,不为利害所动,确遵既定国策,以待钧座从容应付,此即剥复之机,亦国家之幸、民族之福也。”

在此期间,蒋介石曾先后派遣李烈钧、唐生智来云南考察,实际上是监视龙云。然而,唐生智考察后给蒋介石的报告认为,龙云抗战态度比较坚决,与汪精卫叛逃事件并无牵连。报告说:“职默察渠意,似极顾大局,拥护钧座,始终不渝。”这件事,龙云虽有值得怀疑之处,然而通过考察,通过史实的研究最终证明龙云是清白的,这一疑案应该画上句号了。

综观龙云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主要表现,作为一名爱国者他是当之无愧的。

(作者谢本书,1936年生,云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教授)

(责任编辑:荣维木)

《龙云致蒋介石长函》(1938年4月13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6编,第115—116页。

《唐生智致蒋介石电》,同上书,第121页。